

中国 现象学与 哲学评论

第二十二辑

现象学与跨文化哲学

上海译文出版社

中国 现象学与 哲学评论

第二十二辑

现象学与跨文化哲学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第二十二辑,现象学与跨文化哲学/
倪梁康等编著.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7

(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

ISBN 978-7-5327-7853-9

I. ①中… II. ①倪… III. ①哲学—研究—丛刊②现象学—研究—丛刊 IV. ①B-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72747 号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

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

(第二十二辑)

现象学与跨文化哲学

上海译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上海景条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75 插页 2 字数 263,000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7-7853-9/B·451

定价: 8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21-59815625

目 录

《现象学与跨文化哲学》

何谓“中国哲学的形而上学”？

——从西方哲学的视角看 张志伟(3)

何种欧洲中心论？

——胡塞尔论跨文化性 王嘉新(23)

胡塞尔现象学与唯识学之间的“差异性”问题

——从“同构性”原则到“差异性”反思 陈群志(41)

舍勒情感现象学与孟子性善论“以情显性”的

必然性 徐 冰(64)

敬之现象学

——基于儒家、康德与舍勒的考察 卢盈华(83)

共为抑或共在？庄子与海德格尔关于他人问题的

哲思 马 琳(106)

海德格尔的“死”与禅者的“死” 刘 益(132)

海德格尔论身体、疾病与医学

——兼论其与中国传统医学的对话可能

..... 王 珏(166)

【现象学原典】

关于“精神直觉”与“本质直观”的对话与思考

——埃德蒙德·胡塞尔与格尔达·瓦尔特 1920 年

5 月的一次通信 [德国] 埃德蒙德·胡塞尔、
格尔达·瓦尔特(189)

《知觉现象学》前言 [法国] 莫里斯·梅洛-庞蒂(202)

表象的崩塌 [法国] 伊曼努尔·列维纳斯(227)

【现象学研究】

迷恋真理

——回忆埃德蒙德·胡塞尔

..... [德国] 埃迪·奥伊肯-埃尔德希克(247)

胡塞尔哥廷根时期的自我问题：在歧途吗？

..... [瑞士] 艾杜阿特·马尔巴赫(256)

借剥夺(Ent-eignung)以获得(Aneignung)

——现象学还原的悖论

..... [德国] 汉斯·莱纳·塞普(280)

从认识到实践

——海德格尔与美国实用主义及分析哲学

..... [美国] 查尔斯·季格依(301)

马里翁的激进现象学：一个关于“既予”的报告

..... [法国] 高吉安(316)

【硕士/博士论文精要】

胡塞尔的“先验心理主义”概念辨析 黄迪吉(335)

论几何学的现象学奠基

——一次来自奥斯卡·贝克尔的尝试 吴思涵(352)

从集合到流形

——论胡塞尔现象学的现代数学起源 王知飞(372)

编后记 (393)

《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征稿启事 (397)

《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参考文献的格式规范 (399)

(本辑助理编辑：李志璋、李明阳、段喜乐、傅智伟)

现象学与跨文化哲学

何谓“中国哲学的形而上学”？

——从西方哲学的视角看

张志伟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中国哲学史”这个学科是 20 世纪初由一些海外留学归国的学者按照西方哲学的概念、方法和学科分类梳理中国古代文献典籍而形成的，其中首推胡适和冯友兰撰写的中国哲学史著作，他们的贡献至今难以估量，不过关于中国哲学的性质以及与西方哲学的关系等问题亦始终是人们关注的焦点。随着这一学科的发展，中国哲学自身的主体意识越来越强烈，所谓“汉话胡说”的研究方式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诟病。然而，由于中国哲学原本是按照西方哲学的概念、方法和框架建立起来的，离开了西方哲学的概念如何言说中国思想，乃是一个避不开的难题。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可能回到“汉话汉说”的时代，除非我们退出现代学术体系。而且，当代中国哲学并非仅仅是中国古典哲学的延续和发展，实际上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等学科相互融合而形成的，故而西方

哲学无论如何都是当代中国哲学研究不可或缺的参照系和学术资源。因此,在西学东渐已逾百年的今天,准确地理解西方哲学,准确地理解中国哲学,是学术研究的前提条件,当然也是当代中国哲学建设和发展的前提条件,在这些方面我们还有很多工作有待开展,例如哲学术语的统一就是一个大问题。同一个哲学概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等哲学学科中含义不同甚至大相径庭,这样的例子俯拾即是,使得哲学成了一个非常不专业的随心所欲的学科,严重阻碍了当代中国哲学的健康发展。就此而论,准确地理解和使用哲学概念,当属基础工作中的基础工作。这不仅涉及“格义”的问题,亦涉及近年来引起学术界讨论的“反向格义”问题。^①

以“形而上学”概念为例。“形而上学”虽然是外来语,但是并非生造出来作为 metaphysics 的汉语哲学译名,而是由日本人在 19 世纪末根据汉语学术资源——“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周易》)——而形成的,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具有“格义”的性质,相当于以现成的汉语学术资源对应翻译外来文化的概念。简单地说,传统的“格义”是以固有的、大家熟知的文化经典中的概念解释尚未普及的外来文化的基本概念的一种临时的权宜之计,^②最终目的是更准确地理解外来文化,因而翻译避免不了“格义”。但是既为权宜之计,就必须对于由此而可能产生的误解有所自觉并且不断地调试。就“形而上学”这个概念而论,我们往往从“形而上者谓之道”的

① 参见刘笑敢:《反向格义与中国哲学方法论反思》,载《哲学研究》,2006 年第 4 期;张汝伦:《邯郸学步,失其故步——也谈中国哲学研究中的“反向格义”问题》,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7 年第 4 期。

② 参见刘笑敢:《老子古今》,上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年,第 67 页。

意义上理解 metaphysics,无论是在性质、对象、方法,还是在体系框架等方面都存在着深刻的误解。与此相关,由格义形成的西方哲学概念反过来成为研究中国哲学的方法,即“反向格义”,例如仅仅在“形而上者谓之道”的意义上梳理中国的“形而上学”,后果十分严重。不过,更为严重的问题是人们试图从格义-反向格义出发对哲学有所贡献,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让中国哲学发出自己的声音,例如强调中国哲学有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主张重建形而上学乃至弥补西方哲学的“缺陷”。毫无疑问,中国哲学理应对世界哲学做出自己的贡献,与西方哲学也可以相互之间取长补短,但是常言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以对西方哲学的误解(格义)为基础研究中国哲学(反向格义),并且试图重建形而上学,不仅存在着对西方哲学形而上学的误解,不仅存在着概念不清分类不明的范畴错误,而且在理解乃至利用西方哲学的时候无视西方哲学家们对 metaphysics 的深刻反思和批判,甚至试图“理论创新”,其后果可想而知。

中国哲学并非本人的研究方向,相关的论述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批评指正,希望不会影响这篇论文的主旨。本文的出发点是,既然“形而上学”是外来语,须从 metaphysics 来理解“形而上学”,而不是单纯从“形而上者谓之道”去理解 metaphysics。发掘乃至构建中国哲学的形而上学,不仅需要按照西方哲学的方式理解“形而上学”这个概念,而且必须了解西方哲学中“形而上学”发生发展、问题演变的兴衰历史,更有必要了解现代西方哲学对“形而上学”的深刻反思和批判。否则,我们重建的形而上学,要么不是“形而上学”,要么是在重蹈西方哲学“形而上学”的覆辙。

一、“形而上学”的由来

“形而上学”是西方哲学之 metaphysics 的译名,而且是外来语,这是我们在使用“形而上学”这个概念的时候必须明晰的事实。

与许多哲学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概念来自日本学者关于西学的翻译一样,形而上学也是如此,虽然这个译名源自汉语学术资源。日本学者井上哲次郎在 1881 年编写的《哲学字汇》中,据《周易》之“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译 metaphysics 为“形而上学”,^①由于日本学者的翻译使用的是汉字且根据的是汉语学术资源,所以“形而上学”这个外来语进入中国学界并且为人们所接受,相对而言比较容易。按照 1911 年中国人编写的《普通百科新大词典》:“形而上学是就考究形而上之对象(即实在)对于考究形而下之对象(即现象)言。”^②由此可见,形而上学这个译名虽是外来语,但具有以本土学术资源对应翻译西方哲学概念的“格义”性质,造成误解在所难免。

众所周知,metaphysics 的创始人是亚里士多德,但是他本人并没有使用过这个概念。公元前 1 世纪左右,安德罗尼柯整理亚里士多德的讲课笔记,在整理完物理学之后整理亚里士多德讨论第一哲学的笔记讲稿并且名之为“ta meta ta

① [日]井上哲次郎:《哲学字汇》,东京大学三学部印行,明治十四年四月(1881年),第54页。参见[德]李博:《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与作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247—249页。李博称“形而上学”第一次出现在1884年,似有误。

② 参见李博:《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与作用》,第249页。关于形而上学后来在汉语语境中更多地被用来指称与辩证法相对的思想方式,因与本文无关,不再赘述,参见前引第249页以下诸页。

phusika”，即“物理学之后诸卷”，碰巧 meta-这个前缀不仅有“在……之后”的意思，亦有“元”“超越”的含义，“在物理学之后”变成了“超越物理学”从而给物理学奠定基础的意义，遂形成了后世名之为 metaphysics 的哲学学科。按照亚里士多德，后世称之为形而上学的学科以“作为存在的存在”或“存在本身”为研究对象，因而相对于研究存在的某些方面或属性的各门科学而言，研究存在的各个方面和属性的基础即存在本身的第一哲学当是所有科学的基础。亚里士多德尝试了研究存在的各种方式，后来经过基督教神学的“洗礼”，形而上学在中世纪形成了所谓“普遍形而上学”与“特殊形而上学”两个部分。不恰当地说，前者相当于“存在论”(ontology)，后者相当于“神学”。^① 在某种意义上说，ontology 比 metaphysics 要窄一些，相当于 metaphysics 中研究存在的普遍意义、逻辑结构即范畴的部分，而 metaphysics 还包括关于另一类特殊存在的研究，即超越的存在，例如上帝的存在构成了“特殊形而上学”的研究对象。当康德深入反思形而上学之局限的时候，他以先验哲学取代了存在论，即“内在形而上学”，而以伦理学为超越的形而上学另谋出路。尽管此后黑格尔试图重建形而上学，并且创建了包罗万象的形而上学体系，但是自黑格尔之后，西方哲学对形而上学的批判迄今为止仍然不绝如缕。原因在于，形而上学试图以存在作为理性认识的对象并且形成作为一切科学之基础的最高的科学，而在现代哲学看来不存在或不可能存在这样一种最高的科学。

^① 17 世纪初西方哲学家深感 metaphysics 难以反映这一学科的研究对象，于是创造了 ontologia 这个拉丁语概念作为形而上学的同义语，即“研究存在(to on)的科学(logos)”。ontology 旧译为“本体论”，显然不是一个恰当的译名，近年来许多学者主张译之为“存在论”。

既然“形而上学”是 metaphysics 的译名,我们就应该按照 metaphysics 的含义理解和使用形而上学这个概念,并且深入了解形而上学的历史演变,尤其是西方哲学对形而上学的批判,这是不言而喻的。然而,中国学者对西方哲学的了解在相当程度上停留在古典哲学上,对现代哲学少有深入的把握,因而人们更多地记住的是黑格尔对形而上学的赞颂:一个有文化的民族不能没有形而上学,不仅不太了解西方哲学对形而上学的批判,而且十分吊诡地把西方哲学对形而上学的批判看作是复兴或重建中国形而上学的契机。因此,简略回顾西方哲学对于形而上学的批判是十分必要的。

我们可以把从巴门尼德尤其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开始直到黑格尔为止的形而上学称作古典形而上学。在这 2 000 多年中,形而上学作为西方哲学的核心部门,可视为西方哲学的主流,而近代哲学中休谟与康德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基本上判了古典形而上学的死刑,其后虽有黑格尔的复兴,但是终究不过是回光返照。19 世纪下半叶,特别是 20 世纪,西方哲学对形而上学的批判一浪高过一浪。虽然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形而上学在英美哲学界有所复兴,现在在欧美大学的哲学课程中亦有一席之地,但是一方面形而上学不再是哲学的核心部门,不再是哲学研究的重心,另一方面现代哲学视野下的形而上学与古典形而上学有相当大的区别,不可同日而语。^①

休谟与康德对形而上学的批判有其共同之处,两者都是

① 英美哲学界恢复形而上学的研究,起因于蒯因关于“本体论承诺”的理论和斯特劳森关于“描述的形而上学”和“修正的形而上学”的区别,而我们试图重建的“形而上学”恰恰属于斯特劳森认为不可能修正的形而上学。

以经验作为知识的界限,但亦有所不同。休谟坚持经验是知识的界限,将经验的来源悬置,并且出于感觉经验的局限而主张所有基于经验的知识都不过是或然的知识。康德为了证明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颠倒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以人类理性之先天认识形式来解释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强调感性与知性相结合才能形成有效的知识,以往的形而上学之所以无法达到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根本原因就在于其对象实乃理想性的对象而非现实的对象,这些无条件的理想只有在伦理学中才有可能实现。总而言之,无论休谟还是康德都主张形而上学的对象超越于经验,不是认识的对象。

黑格尔去世之后,尤其是20世纪以来,西方哲学展开了对形而上学的激烈批判。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主张“我的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①,因而凡是可说的都可以说清楚,凡是不能说的就必须保持沉默,形而上学就属于不可说的领域。在他看来,人类有一种企图冲破语言牢笼的要求,而哲学的目的就是指出这是绝对没有希望的,除了以沉默待之,我们没有别的办法。逻辑实证主义更是推进了通过语言分析拒斥形而上学的工作。在他们看来,知识由命题(判断)组成,一个命题要么是重言式,可以由逻辑判定真假,要么是关于事实的,可以由经验而证实其有效性。由于形而上学关于其对象的知识不能满足上述条件,甚至不存在真假对错的问题,因为都是些没有意义的胡说。

在20世纪西方哲学对形而上学的批判中,海德格尔无疑独树一帜。海德格尔试图把存在问题从形而上学中拯救出

^① [奥] 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郭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79页。

来,在他看来,2 000 多年的形而上学史乃是存在的遗忘史,或者说,哲学家们以为对于存在物的抽象所形成的普遍共相就是给一切存在物提供基础的存在本身,而实际上混淆了存在与存在物的存在论差异,以对待存在物的方式对待存在,使得存在变成了存在物,这意味着以往形而上学处理存在问题的所有方式都是成问题的。前期的海德格尔试图通过对人这种存在者(此在)的存在即生存(Existenz)来揭示存在如何可能通过人的存在显现出来,而这一源始的生存境域是前科学的、前理性的,在此境域中由此在对存在的领会(Verstehn)还原出存在通过此在而显现的结构,说明为什么此在作为始终处在去存在(zu sein, to be)的存在者却遗忘了存在的根本原因。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颠覆了形而上学的基本观念,把生存活动置于比理性认识更深层次的并且具有决定意义的源始的地位,由此而提出了“基础存在论”。

问题是,基础存在论还是形而上学吗?对海德格尔来说当然不是。基础存在论的目的是把存在问题从形而上学中拯救出来,形而上学是不可能解决存在问题的,所谓为一切存在论奠基的意思是深挖传统形而上学遗忘存在的根源,说明形而上学误入歧途的原因,尤其是返归源头去思形而上学原初错过了(在海德格尔看来这是形而上学必然会错过的)而没有思的东西。但是《存在与时间》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并不理想,海德格尔甚至认为他失败了。经过 1930 年代的思想“转向”,海德格尔试图“克服”形而上学,他把自古希腊哲学以来的形而上学称为“第一开端”,形而上学的历史在黑格尔和尼采那里终结了,非经“跳跃”不能进入“另一开端”。对海德格尔来说,形而上学的问题如莱布尼茨所言乃是“为什么存在者

存在而无反倒不在”的问题，而形而上学仅仅关注于存在者的存在，遗忘了显现为存在者而自身“缺席”的存在。显然，对于自身缺席而“不存在”的存在，任何形而上学乃至任何科学都是无能为力的。

就此而论，中国哲学的一些学者从海德格尔哲学中的非科学主义因素看到了原本缺少科学因素的中国哲学的希望，跃跃欲试复活或者重建形而上学，误解之深，无出其右。究其原因，与近年来学者们讨论的“反向格义”的方法论局限密切相关。

二、从格义到反向格义

刘笑敢教授在《哲学研究》2006年第4期发表了题为《反向格义与中国哲学方法论反思》的论文，着重以关于“道”的解释为焦点发起了关于“反向格义”的讨论。此后，张汝伦教授在《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发表的论文《邯郸学步，失其故步——也谈中国哲学研究中的“反向格义”问题》则通过对“本体论”（也包括“形而上学”）这个译名的深入分析，指出以西方哲学的门类划分来重构或重新叙述中国哲学，是一种比一般观念层面的反向格义后果更为严重的反向格义。两位学者关于反向格义的讨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

所谓“格义”源出佛教东传时人们以中华本土之儒、道思想乃至术语理解佛经的需要，实为权宜之计。但从广义上讲，以本土之学术资源理解异文化的文献典籍，格义是不可避免的事，关键在于理解者和解释者是否对此自觉，即是否清楚格